

“以权谋房”乃腐败“升级版”

罗浩声

日前，十八届中央第十一轮巡视反馈情况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向社会公布。根据本轮巡视“回头看”的反馈情况，北京、重庆、广西、甘肃4省份都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北京市存在领导干部“以权谋房”等问题。

“以权谋房”出现在中央巡视报告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15年10月，中央巡视组在向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就指出，该局有的领导干部以管房权谋私和“以权谋房”。同一时间段，中央巡视组在向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等央企反馈的情况通报中，也点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梳理中央巡视通报和相关媒体传递的信息，官员“以权谋房”这种“常见病”，其“临床表现”带有共性的大致有几种：有的是以极低的折扣和优惠价，从开发商手中“购买”商品房；有的是低价购买下属企业开发的“商品房”或建设超标住房；有的是采用空手套白狼的办法，低价拿到“房票”后，直接转手获利；还有的则是一些手握行政权力的机关，给达到一定行政

级别的官员以团购等方式购买商品房的（过去的官员因调动频繁，在曾经的工作地多处占有住房问题尚不在此列）。

官员“以权谋房”，表面上看，是当事者面子大、能量大，说话好使，背后其实无不潜藏着利益的私相授受和交换。因钱多、房多、女人多被戏称为“许三多”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就是一边通过“以权谋房”获利，一边滥用职权，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承建工程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去年，央视播出的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披露，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先后向某知名国企买下三套房，价格和市场价之间相差两千多万元。完成巨额利益输送的动因，是其任职期间，为该企业取得财政资金支持 and 建设用地等事项上提供了帮助。可见，“以权谋房”，不管打什么幌子，其本质是官商勾结、各取所需。

说“以权谋房”乃腐败“升级版”，是因为与一些司空见惯的腐败现象不同，近年来有的官员“以权谋房”问题的暴露，主要源于“外力”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外力”，一个是来自上面的巡视，再

一个是有的官员因其他问题带出了“以权谋房”问题。官员“房事”猫腻露馅，很少来自于体系内正常监督，表明这个问题带有很强的隐蔽性。通常情况下，组织上不容易发现。恰如许迈永在悔过书中交代的，作为“炒房一族”，他不用自己出马，也不用自己出钱，而是通过商人买进售出，坐享其成。

在房价居高不下、老百姓购房压力倍增的当下，少数官员“以权谋房”，不仅加剧了社会不公，也使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受到了损害。为此，一些专家学者积极建言，力求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2013年曾开展“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并拿出了三份报告：《国外官邸制研究》《中国古代官邸制研究》《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住房现状分析与改革趋势》。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也提出要“探索实行官邸制”。但从目前情况看，这方面的探索好像并未取得多少实质性突破。

笔者以为，“以权谋房”的腐败伎俩，有的官员之所以屡试不爽，根源还在于法律边界不够清晰。尽管2007年“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早有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

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的，以受贿论处”，但什么叫“明显低于市场价”，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这增加了执行的弹性空间，也让有些腐败分子钻了空子。因此，当务之急，需尽快完善相应的细则，从法律上划出更为清晰的红线，堵上漏洞。

从源头上减少和遏制“以权谋房”腐败问题，治本之策还是要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现在看来，全面推行这项制度的时机可能尚未成熟，这就需要实行更为严格的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在落实干部逢提必核、逢提必查的基础上，还应加大个人年度申报的抽查核比例，实现内部监督的“全覆盖”。对房产购买方式、资金来源等说不清楚，或者隐瞒不报的，要作为重点线索进行调查。



让学校享有适当惩戒权非常必要

史洪举

近日，青岛市政府发布地方性规章《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提到“中小学校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应当进行批评教育或者适当惩戒”。据了解，这是全国或地方教育性法规中，首次提出“惩戒”的概念（2月21日《新京报》）。

近年来，学生太顽皮不好管教让很多学校管理者头疼，尤其是校园暴力事件屡屡发生，且很多事件情节恶劣。但目前对过于顽劣的学生或校园霸凌施暴者的惩戒相当“软弱无力”，学校无感也不敢对涉事学生施加惩戒，不能让犯错者意识到规则的重要意义和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因此，地方性规章首次赋予学校惩戒权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当前，多数在校中学生属于未成年人，即便其非常顽皮难以管教，甚至对他人施暴造成非常严重后果，也无法对其施加治安管理处罚，追究刑事制裁。未成年身份成了其不断违规、肆意妄为、欺凌他人、为非作歹的“护身符”。如果再漠视学校惩戒权，有劣迹者更会无法无天乃至走上歪路，受害人也感觉不到公平正义和抚慰。

学生的教育管理涉及社会、家庭、学校等多方面。而社会因素过于宏观，短期难以改善。家庭环境相对封闭，且很多家长对未成年人过度娇惯，不忍心惩戒，外部干预通常又难以进入。从可操作性上讲，赋予学校适当惩戒权以改变校园环境，实现对

学生正常的管理教育也就成了众望所归。

目前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中，学校均承担了相应责任。多数学校因“管理不到位”需赔偿受害人，甚至学校负责人或者班主任也要接受相应行政处分。但同时，学校没有对被侵权学生进行惩戒式教育，老师只能苦口婆心地说服学生，无权对有暴力倾向的学生施加更严厉的惩戒，权利与义务极其不对等。

应该强调，惩戒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手段，如果仅仅局限于口头的批评教育，却像“鸵鸟”那样漠视惩戒教育，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是没有担当的表现。世界通行的教育经验认为，对于年龄小、认知差的孩子，需要通过即时性的痛苦，才能让其马上意识到自己犯错了。2016年11月1日，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对实施欺凌和暴力的中小学生在依法依规“采取适当的矫治措施予以教育惩戒”，要“充分发挥教育惩戒措施的威慑作用”。

因此，有必要加快探索和研讨，将学校惩戒权上升到国家立法层面，以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规定赋予学校适当惩戒权，并对惩戒的方式和范围作出界定，如明确训诫、隔离、剥夺某种特权、留校、短期或长期停学及适当体罚，同时严格禁止不当体罚。这样才能让学校和老师有必要的约束与惩戒手段来维护教学秩序，进而做到教育与惩戒相结合，以强有力的手段塑造未成年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促使其从小养成底线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

画里话外

据2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79岁的北京退休老人蒋光耀如今最大的心愿，是在80岁之前见一见自己通过“希望工程”资助过的11个孩子。他先后资助了11个孩子，除了其中两个还有联系外，其他孩子均失去联系，有些甚至从未联系过。

素昧平生巧结缘，爱心助学好些年。施恩本不为图报，一声问候也简单。

读书做人德为重，知恩感恩当有心。若非忘恩负义徒，不愿见面莫勉强。

郑晓华 文 张书信 绘

热点 @微评

本期主持 杨继学

据2月21日《新京报》报道：2月18日，河北武安市“爱心村”迎来又一个弃儿，这也是自1996年收养第一个孩子以来，“爱心妈妈”李利娟收养的第103个孩子。20年来，为了这些孩子，李利娟从“百万富翁”到2011年入不敷出，再到如今欠下200多万元债。

点评：为了收养弃儿，从富翁变成“负翁”，李利娟的善举固然感人，但这种帮一方“毁”一方的结果，没什么人愿意看到。社会需要李利娟，更需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救助机制。

②复发率：这样的善举靠个人力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③关联：政府应该出手予以帮助。

过多过滥的“一票否决”早该规范了

宛持平

为加快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服务效能，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要统筹规范针对乡镇的评比表彰、示范创建等活动，未经省级党委和政府批准，不得对乡镇设置“一票否决”事项（2月21日《北京青年报》）。

“一票否决”，作为上级部门督促下级创先争优的工作方法，有其独特的价值，可以凸显某项工作的重要性，给各级官员施加一定的考核压力，迫使其认真对待政策要求，以确保各项任务得以顺利实施。应该说，“一票否决制”形如悬在官员头上的一把利剑，相关工作不达标，就有被免职的危险，涉及乌纱帽，官员自然要小心翼翼对待了。

但在一些地方，“一票否决”被肆意扩大适用范围，本来不需要搞“一票否决”的工作，也被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强行加上，以至各种“一票否决”泛滥成灾，基层官员则为之叫苦不迭。有专家指出，如果什么工作

都“一票否决”，也就等于“一票否决”。其结果，必然使基层无所适从，工作陷入被动。同时，有些基层单位为了不被“一票否决”，即使某项工作有问题或落后，也会千方百计隐瞒事实真相或隐瞒、虚报数字，报喜不报忧，这不仅使下情不能上达，而且容易助长“唯上病”，客观上助推弄虚作假之风与形式主义。

过多过滥的“一票否决”早该规范了。此次中办、国办印发的《意见》，对“一票否决”进行规范，严格“一票否决”的审批权限，压缩“一票否决”的使用范围，这是一种制度性纠偏，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提升基层善治水平。笔者以为，各级党政组织应以此为契机，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求真务实的作风，不再抱着“一票否决”的思维、作风不变，下定决心解决“一票否决”事项过多过滥的问题，切实维护好“一票否决”的严肃性。长远来看，需要进一步完善干部管理制度和政绩考核机制，形成一套更符合科学治理原则的绩效评价体系，让考核这根指挥棒更好地发挥作用。

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重在“抵达力”

新华社记者 姜伟超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对加快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等提出新要求。作为改革红利传导的“最后一公里”，基层政府服务能力事关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应重在增强“抵达力”。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在改革向纵深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加快的当下，乡镇既是热火朝天的发展沃土，也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和社会矛盾的集聚点。眼下社会各项公共服务不断完善，但“最后一公里”难题仍然存在。好政策到了基层“写在纸上”“挂在嘴上”“走在路上”的事例时有发生，说明一些乡镇政府还存在服务理念滞后、能力不强、效能不高等问题。

一些乡镇政府服务能力“末梢堵塞”的形成，既有服务意识“转身过慢”的原因，也与乡镇政府“资源有限、责任无限”的现实

密切相关。加上乡镇政府在工作中法律和制度支撑不够完善，“办个证跑断腿、盖个章磨破嘴”等问题难以避免。

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将重点放在乡镇政府服务能力的“抵达力”建设上。例如，加快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步伐，优化乡镇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改进乡镇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机制，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建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还必须有所创新。要建立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由“花钱养人”向“花钱办事”转变。同时，还要提高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增加群众对公共服务供给决策及运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群众评价成为乡镇政府服务等级的“量化指标”。

说到底，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好与坏、快与慢，关乎城乡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保障和监督考核，走实、走稳、走好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乡村小路”，才能让改革成效真正“进村入户”，让乡镇强筋壮骨，使广大群众更好共享发展成果。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医务人员如何“涨薪”考验医改智慧

武洁

近日，《关于开展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出台，要求完善公立医院薪酬制度，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2月21日《宁波日报》）。

所谓改革，说白了就是对当前利益分配进行调整，医改当然也不例外。某种程度上，无论“以药养医”也好，“医生荒”也罢，医疗领域的各种“病症”，症结在于当前医疗领域利益分配机制存在不合理甚至严重扭曲。假如公立医院运营成本缺乏合理的分担机制，医院不得不自行寻生路、自负盈亏，那

么，医院商业化，医疗服务成为一门生意，就不意外了。至于儿科、急诊科“医生荒”，同样不能全怪辞职转行的医生缺乏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毕竟，从业者的生存与发展，从来就是任何职业或行业发展的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薪酬改革提到医改关键环节的高度，并未夸张。只有提高医务人员的收入，医务人员不必依赖于“以药养医”“检查养医”，才能专注于医疗服务本身，医疗也才能回归本位。

但涨薪究竟来自哪儿，十分关键。从目前的薪酬改革策略来看，提高诊疗费用，鼓励多劳多得，基

本是医务人员收入提升的两大来源。长期以来，过低的诊疗费用、医疗服务的价格远远不能体现其价值，无疑是医疗领域最大的扭曲，也导致包括挂号黄牛、小病扎堆大医院等种种怪现状。诊疗费用的回归，大有必要。而通过医保涵盖大部分上涨的诊疗费用，不增加患者的负担，也算是考虑周到。

至于多劳多得，看起来也公平合理。医务人员的收入与劳动挂钩，有望形成良性的激励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但多劳多得是一种商业思维，用于医疗领域需谨慎。假如仍简单地以诊疗费收入作为评判基准，其

实和原来把医疗服务当作一门生意并无明显差别——过度追逐医疗服务收入，也完全可能让医疗服务继续扭曲。因为，不同医疗科室有着完全不同的特性，多劳多得不能简单地以业绩来评判。以儿科为例，儿童的配合程度往往较差，沟通也比成人患者困难，同样的一项治疗，儿科医生往往面临更大的困难和阻力，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耐心，但收费甚至低于成人普通门诊。如此，按诊疗收入怎么体现多劳多得？

基于此，提高诊疗费，医疗价值回归，固然令人期待，但医生薪酬机制如何成为一剂“良药”，避免掉入商业陷阱，尤其对于一些有着特定属性的医疗服务，如何合理定价……这些问题的解决，仍是对医改智慧的考验。

据2月21日《广州日报》报道：一名90后女大学生卖了80万元婚房，在武汉创办了首家宠物殡葬机构，为宠物善终。两年间，一共有600多只动物，包括狗、猫、兔子、香猪等在这里走完最后一程。

点评：随着社会发展与生活观念的变化，宠物已成为很多家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带来巨大商机。女大学生的经历告诉我们，有时候创业创新的门槛并不高，关键在于是否善于发现以及有没有勇气。

③官路风流：养宠物的人一般不差钱，这是门好生意。

④冷风机：啥事都怕一窝蜂，这么一报道，抢活的就来了。

据2月21日《海峡都市报》报道：近日，一台24小时自动售药机被设置在福州仓山中天金海岸小区门口。该设备24小时运营，可线上支付，能满足市民“突发性”“一般性”的用药需求。今年福州将设置1000台自动售药机。

点评：夜间买药难是很多地方的通病，自动售药机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患者，可谓当地医疗系统供给侧改革的一次主动作为，提升了公共服务的质量，也为城市形象加分。

③染发剂：这种事情需要政府支持，不然不容易长久。

④Orton：这跟自动售货机有区别，应该赚了钱。

据2月21日《泉州晚报》报道：2004年酒驾禁令出台，催生了酒后代驾行业；2011年“醉驾入刑”正式实施，酒后代驾生意渐火。在一段时间的适应后，代驾的便利逐渐凸显，然而，发展多年，代驾行业依旧存在不少问题，代驾纠纷也频频发生。

点评：代驾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一些人带来烦恼，原因就在于其缺乏行业规范，导致入门门槛太低，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若放任不管，不利于其持续健康发展，也有损广大司机利益。

③勤打开：到底该归谁管，上面可能还没弄清楚。

④贵客光临：价格也没有标准，都是自说自话。